

桂
堂
文
库

刘登翰 | 著

跨域与越界

KUAYU YU YUEJIE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跨域与越界

刘登翰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特邀编辑:程文梅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域与越界/刘登翰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

ISBN 978-7-01-015813-6

I. ①跨…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6094 号

跨域与越界

KUAYU YU YUEJIE

刘登翰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400 千字

ISBN 978-7-01-015813-6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桂堂文库

排序按作者姓氏笔画：

刘登翰 《跨域与跨界》

孙绍振 《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

朱立立 《阅读华文离散叙事》

汪文顶 《现代散文学初探》

南 帆 《表述与意义生产》

郑家建 《透亮的纸窗》

姚春树 《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

席 扬 《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

辜也平 《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琢》

葛桂录 《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

赖瑞云 《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

潘新和 《“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2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刘登翰教授的《跨域与越界》则反映了他三十多年的学术之旅。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 3

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 / 11

关于华文文学几个基础性概念的学术清理 / 20

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式转移 / 34

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运动方式

——关于“一体化”和“多中心”的辨识 / 52

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

——《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引论 / 61

第二辑

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 81

台湾文学:分合下的曲折与辉煌

——《台湾文学史》总论 / 96

香港文学:历史交错的绚丽画卷

——《香港文学史》导论 / 145

文化视野中的澳门及其文学

——《澳门文学概观》绪论 / 177

第三辑

论海峡文化 / 207

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 / 220

论闽台文化的地域特征 / 234

闽台社会心理的历史、文化分析

——以两岸闽南人作为中心 / 257

论闽南文化

——关于性质、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 / 284

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 299

论《过番歌》的版本、流传及文化意蕴 / 309

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问题

——以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观察点 / 321

海上丝绸之路、海丝文化与闽南 / 332

第四辑

传统本位的现代变奏

——兼论金门的历史文化对李锡奇现代绘画创作的影响 / 343

台湾当代画家十题 / 355

附:刘登翰主要学术著作书目 / 387

后记:我的学术之旅 / 389

第一辑

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

一

“华文文学”——这样一个整合性的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在一种怎样的思考背景上,被提出来的?相信对于关心华文文学学术发展的研究者,这是一个尚未被充分重视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一般都认为,“华文文学”的正式命名,始于1996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学术研讨会上。这里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遭遇,使中国南部濒海的疆域——台湾、香港、澳门,在东西方殖民者的侵占下,处于一种政治上与母土的“碎裂”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大阵营对垒和新中国成立,加深了这些地方与祖国大陆的政治对峙和文化的“盲视”。因此,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大陆政治格局的变化,都使对峙的双方首先从文化上(文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一种彼此重新“发现”的喜悦与惊诧。最初是少数有条件接触到香港、台湾文学资料的研究者,“探险”似地进入这一领域。但到1982年于广州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标志着这一研究逐渐从零散的个人的学术行为,转化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学科性建设的开始。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最初被作为“台湾作家”研究的诸如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等,他们更确切的身份是从台湾移居美国的美籍华人作家;而与此同时,正在复苏的东

南亚华文文学,也进入与东南亚诸国交往密切的广东、福建学者的视野。于是,在1986年于深圳大学召开的第三届学术研讨会,便在“台湾香港”(第五届的中山会议增加了澳门)之后,添了一个“暨海外华文文学”,以示研究视野的拓展。然而,“台港澳文学”是中国文学,而“海外”则是别国的文学,二者并置不仅拗口,也引起一些争议。于是,便有了庐山第六届会议以“世界华文文学”的易名。易名本应是对对象的一种重新定位和诠释,然而“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命名,有着这样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学术背景,重新命名之后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实际上并未脱离原先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框架和轨迹,无论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视角或方法,并没有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改变。

在海外,对漂离母土的华人及其族裔文学的关注和讨论,从很早就开始。但大都是对于具体作家创作的批评和介绍,还不是我们今日所说的带有整合性意义的“华文文学”研究。手头没有详细资料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不过我以为,1989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是较早的重要一次。“大同世界”的会议主题,和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在内的会议参与者的广泛性,使它具有了整合性的视野和意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华文文学整合性建构的论题,诸如“多元文学中心”、“双重经验书写”等等,对后来华文文学的研究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稍后,美国柏克莱大学的亚裔系,连续两届以“开花结果在海外”为主题,举办了有众多国家和地区作家和研究者参加的华人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如会议主题所标示的,关注的重心是“开花结果在海外”的华人文学书写,但参与者的广泛性和论题的深入是前所未有的。最近的一次在2006年春天,由王德威主导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邀请了来自美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华文作家以及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举行了一场人数虽不多但题意深远的“华语语系文学研讨会”,从另外一个视角,与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展开对话。其论题包括中国经验与中国想象在地域、族裔、社会、文化、性别的移动与转化,华裔子民移徙经验和典籍跨越,翻译与文化生产,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的世界想象,等等,对“华语语系文学”这一概念内涵,提出了新的理论阐释。

回顾从国内到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有几点印象值得提出:

其一,华文文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从对其命名到诠释的游移不定,歧义互见,都说明它尚不成熟。这一点从国内到海外,基本一样。不同的论者,不同的视角,常会有不同的诠释。即使同一论者的前后表述,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左的地方。这是一个新的学科必然经历却又急需走出的过程。

其二,国内和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认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上的某些差异。就其对象而言,国内的研究往往把大陆的文学摒除在外。这自然有着“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缘自“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而来的学科形成的背景。然而,大陆本土文学的“缺席”,不仅使号称“世界”的华文文学研究成为一种“不完全”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大陆本土文学与其他地区 and 国家的华文写作“对话”的缺席。而在海外的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对话”十分重要,是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条件。王德威在他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中,就十分强调这种“对话”,他说:在全球化的时代,“华语文学提供了不同华人地区互动对话的场域”,“华语语系文学所呈现的是个变动的网络,充满对话也充满误解,可能彼此唱和也可能毫无交集,但无论如何,原先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①实际上,由“对话”所呈现出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的差异,正是它们获得独立生命和价值所在。

其三,国内的研究往往不将华裔的非华文写作包含在内。在国内的学科谱系中,华裔的非华文写作,主要是外文系的学者关注的对象,因此,便有了“华文文学”还是“华人文学”的命名之争。尽管这种现象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但它仍然说明,国内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以华文书写为界定的。其关注的中心,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传统,在文学书写中的回归与变异。而华裔的非华文书写,其核心不在语言而在创作主体的族性,更多关注的是华人族属身份所包容的文化,在异文化土壤中的隔代生存与变化,以及如何将华族的文化身份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源,从而在所居国多元文化的网络中构建华族的文化地位。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其四,文化是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心,只不过其侧重面各有不同。中国大陆的学者最初更多的是关心海外华文书写的中华文化遗产,对中华文化在异文化时空环境中的融合与变化,是近年才逐步得到重视的主题。而海外“新移民”作家,如其主要的理论发言人陈瑞琳所表述的,是在生命的“移植”中对母体文化的“放弃”和“寻找”,在摆脱“家国文化”的心理重负中,“重新审视和清算自己与生俱来文化母体,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①而在王德威的“华语语系文学”观念里,是在中文书写的越界和回归中,作为一个辩证的起点,探讨“中文书写如何承载历史中本土或域外书写或经验,多元跨国的现代经验如何在歧异的语言环境中想像中国——华人——历史”^②。简言之,中国大陆学者更多注意的是文化遗产与变异中的异中之“同”,而海外学者的观察,更多的是集中在文化延播与变异中的同中之“异”。

其五,方法论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华文文学研究者的重视,特别是比较文学方法的引入。最先将这一研究方法引入华文文学研究,同时将华文文学导入比较文学研究范畴的,是兼有着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学术背景的饶芃子教授。她的不逾余力的倡导,使华文文学研究者在视野的不断扩大中,借鉴比较文学的方法获益良多。随着年青一代学者的不断加入,受到关注的方法论问题对华文文学研究学术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某些认识上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有人建议将这种认识差异称为“中国学派”。我想“派”则不必,因为中国大陆学者的认识并不一致,也在变化之中,这是一个有待丰富和完善的学科,称“派”为时尚早。但是,差异是对对象不同侧面和层面的认识,差异可能是一种“片面”,但却由此产生互补的需要,提供对话的空间,从而使对对象的认识立体化起来。

① 陈瑞琳:《“迷失”和“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饶芃子主编《思想文综》第10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②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二

华文文学是一种“离散”的文学。这里所说的“离散”，是指华文文学散落在世界不同空间的存在状态。它根源于华人离开母土的世界性迁徙和生存，这是华文文学重要的发生学基础。

有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需要深入辨析。我们常说，华文文学是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相同的一种语系文学。这是就语言的世界性存在现象而言。然而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语言的世界性存在有两种情况，在诸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等这些在“语言宗主国”之外，“世界其他地区以宗主国语言写作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辩证色彩，都反映了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力量占据某一海外地区后，所形成的语言霸权及后果。因为外来势力的强力介入，在地的文化必然产生绝大的变动，而语言以及语言的精粹表现——文学——的高下异位，往往是最明显的表征。多少年后，即使殖民势力撤退，这些地区所承受的宗主国语言影响已经根深蒂固。由此产生的文学成为异国文化的遗蜕”^①。华文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播与存在，不是“殖民宗主国”的“文化遗蜕”，其性质与此完全不同。

华文是伴随着19世纪以来华人的海外迁徙，而大量播散世界的。其时中国正面临着世界殖民主义的侵扰，迫于生计而无奈谋生异邦的华人，无论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还是到同样处于殖民压迫下的欠发达国家，都是弱势群体群，华文在华人所居国的语言和环境中的，也都是弱势语言和弱势文化。即使由于华人的刻苦奋斗，在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甚至在某些国家，华人经济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强势经济，但仍无法改变华人在所居国中语言和文化的弱势地位。这一状况无论在华人政治、经济都处于弱势的欧美诸国，或者在经济略居强势的某些东南亚国家，都是一样的。华文首先是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

^①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像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5期。

族群保留母语的一种生存方式而存在的;其次才通过华人的文学书写,成为他们铭刻自己几近衰亡的族群记忆,再现从国内到海外的双重生存经验而获得精粹体现的。华人的华文书写,是一种母语书写,而其他受到西方殖民的国家对宗主国语言的书写,则是一种被迫的非母语的书写。即使在殖民势力溃退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这一后殖民的文化遗蜕。前者是伴随移民的语言移入,是移民主体对于母语的语言行为,在所居国的语言环境中,是一种弱势语言;后者则是伴随殖民而来的语言“殖民”,是殖民者强加于被殖民者的语言霸权。二者有着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身份变化。^① 华人身份的每一变化,同时也反映在华文文学与其文化母体的错综文化关系之中。20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海外移民,保留着“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不论其是否加入移居国国籍,也不论其数代不归,都被视为中华子民,即为华侨。此时他们的文学书写,是一种华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海外支脉,其国籍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20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的政治认同,海外华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大多选择加入所居国国籍,他们的身份由华侨变为海外华人,成为所居国多民族构成的一个成分——华族。在国籍改变之后,在文化认同上却无法完全改变,实际上存在着华人对自己母体文化与对所居国本土文化的双重认同,或者不同程度地在自己族裔文化基础上融吸所居国的本土文化,从而形成了具有所居国文化特色的华族文化。国籍认同与文化认同的不完全一致,是这一阶段华族文化的特点。而到他们数代之后的华裔,已经融入在所居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国籍认同与文化认同已趋于一致。在许多情况下,缘自他们父祖而来的无法改变的族裔文化身份,正逐渐变为一种身份文化,成为他们参与所居国多元文化建构的一种资源。无论他们用华文写作或非华文写作,他们是透过自己已经认同的所居国文化,来重新辨识和书写自身的华族文化——尽管这种“辨识”和“书写”,充满了误读和重构,却成为华裔文学书写普遍性的特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海外移民,成为散居于世界不同空间中各自

① 刘登翰、刘小新:《华人文化诗学:华文文学研究范式的转移》,《东南学术》2004年第6期。

独立存在的中华族裔,而反映他们生存经验的文学书写,却难以完全割断母体文化的精神脉络,在双重文化的认同、融吸和重构中,既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地呈现为所居国少数族裔(华族)的文学存在。华文文学客观的这种“散存”状态,是我们观察和思考并重新进行对话、比较和整合的无可回避的事实。

三

然而,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象的整合建构。

其实,所有后设的文学概念,都是一种想象的建构。从本质上说,文学书写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每个作家都根据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审美体验,进行个人化的创造。但每个作家的个人化创造,同时又被纳入一个系统之中,不但他生活在这个社会文化的网络系统之中,从书写的语言方式,到感受的情感结构和传达的文学形态,都不能不受到这一文化网络无形的制约,从而使个人化的写作深烙着这一群体性的文化印记。正是作家个人化的文学书写,同时成为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才使文学研究更为普适性的想象的建构成为可能。

国家的或者区域的文学史书写,是在政治疆域的边界之内,对文学发展进行跨时间的建构。这种建构虽然有着历史书写者各自的性格和特征,但总的说来,他并不能摆脱家国叙事的背景,或者竟就是家国叙事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然而华文文学,是超越国籍空间的想象,它打破疆域,是一种超地理和超时空的整合性的想象。

中国的海外移民,使华人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散居”的族群。事实上,并非每个移居到世界任何地方的华人,都“单个”地生活着,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他都生活在、或被视为生活在某个族裔的网络之中。他的肤色,他的语言,以及他的文化——从心理到行为,是一种无形的纽带,将他们“归纳”在一起;更何况还有一个有形的“唐人街”,成为他们族裔和文化存在的象征。海外华人的“散居”,实际上是一种“离散的聚合”。“离散”是相对于